前未曾铸钱。这里我们不妨把阿保机的年表排列一下：

唐天复元年(901年)阿保机成为军事首长连破室韦；

“明年”“明年”又“明年”，讨黑车子室韦，是为904年；

“明年”复讨黑车子室韦，是为905年；

“明年”痕德堇可汗殂，阿保机当政，是为906年。

元年冬十月”讨黑车子室韦，破之，仍为906年。

“二年夏”，讨乌丸、黑车子室韦，是为907年。

“三年冬”遣鹰军讨黑车子室韦，破之，是为908年。

“四年三月次栾河，略蓟州，冬十月置铁冶”是为909年。

又过七年后建元神册，是为916年。

又过六年后改元天赞，是为922年。

我们不厌其烦的排列阿保机建元之初的年表，使我们可以知道：

(1)阿保机由901年当军事首长，一直和室韦战争不息，相持了六年。

(2)阿保机虽由906年当政，没有建立年号达十年之久。在这期间，前三年解决了同室韦的战争，四年春即“破栾河，略蓟州”而后“置铁冶。”这和《食货志》的征幽蓟，师还……命置铁冶”记载完全吻合，足以证明《食货志》里所指“坑冶”即铁冶无疑。

(3)阿保机906年当政未定年号过了十年，916年始建元神册，又六年，922年又改元天赞。这就是说，天赞之前阿保机已经掌权十六个年头。天赞之前铁可冶，又何不能冶铜，既可冶铜又何不可铸钱？

《辽史·太祖本纪》里还有这样一段记载，即阿保机当政之初，诸兄弟叛复不常。为了征服兄弟叛乱，大军多出，在七年五月时，曾搞到“辎重不相属，士卒煮马驹，采野菜为食，孳畜道毙者十七八。物价十倍……”。这个时候已经“物价十倍”可见用钱已成为普遍现象。辽国当时既然已普遍用钱，又为什么不去铸钱呢？

所以天赞年号并非辽代第一个年号，天赞元年更不等于阿保机建元登基第一个年头。天赞元年之前，阿保机掌政已经十六个年头。征室韦也好，置坑冶也好，都是这十六年内的头五年干的事，后十一年竟然不去铸钱？试看中原的许多政权都是在草创时期即开始铸钱，大中、永昌、天命……举不胜举。铸钱建元，这都是建政必须做的事。因为一是可以解决财政问题，二是可以起号召作用，三是可以表明其事业的正规性和独立性。何况阿保机的父辈已有“广土众民”之志！他自己竟会在当政十六年内不懂得铸钱？退一步讲，即使是撒拉的未曾铸钱，天赞之前是必有所铸的。

郑家相认为“盖太祖以前，契丹立国虽久，而组织未备，年号未立，故钱制不一，钱文莫定”。“太祖以前，未有年号，无著年号”，这都是恰当的评论。综合各家所说，先有北宋董逌、李孝美亲见并著于书，后有南宋洪遵追记，又经郑家相考证，都认为辽代建元之前有所铸。我们相隔千年以后，又何道理怀疑当时人所亲见呢？

(三)研究辽钱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

1.辽代属于边陲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，大体上与五代北宋相始终，可以说是跑步进入封建社会的。虽然深受中原汉族文化影响，但其接受是有选择性的，其特点是跳跃性和不稳定性，这一点贯穿于整个辽代的典章文物之中。辽钱亦应同样具有这种特点，绝不应以其他朝代常例推论。如契丹文字总的说是受汉字影响制定的，大字是以汉字笔划增损而成，但小字却改变为以回鹘文字为基础的拼音文字。前后仅只数年，相差竟然如此之大。所以辽钱的制作形体书法早期后期不会一致，继承性不一定明显。

2.《辽史》的产生过程如前所谈，是一种特殊过程。虽然基本可信，但疏漏牴牾较多。必须结合辽代的特殊性，全面分析而后结论。绝不应死扣片言只字，那样就会犯钻牛角的错误。除了如前所述“鼓铸”“坑冶”的例子外，还有人引用胡峤《陷北记》语，“上京西楼有邑室市肆，交易无钱而用布。”因为胡峤留居契丹七年，人们就认为他的记述属于耳闻目睹。经查胡峤陷北在947年至953年之间，相当于世宗和穆宗时代，此时确已铸了天禄通宝和应历通宝。胡峤还记述“……三面皆室韦，……其地多铜、铁、金、银，其人工巧，铜铁诸器皆精好”。有人认为《辽史》“坑冶则自太祖始并室韦”之说即本出胡峤《陷北记》[9]，还有人认为室韦指地名，并非民族，可见胡峤记述不实，《辽史》自亦不免错讹。

注：

① 郑家相：《辽钱考》。

② 杨树森：《辽史简编》辽宁人民出版社。

③⑩张正明：《契丹史略》中华书局。

④⑤⑦唐石父：《四朝钱币研究管见》。

⑥ 奥平昌宏：《东亚钱志》。

⑧ 《内蒙古文物考古》第二期。

⑨ 沈括：《梦溪笔谈》。

契丹币铭与国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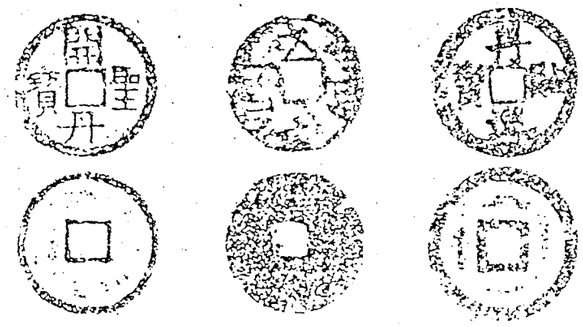
即 实

一

笔者在过去只注意于辽钱的契丹文铭，却未瞩目于辽钱的汉字铭文。去年无意中见到三枚辽钱的汉字铭文复印图，特别引起了我的兴趣，也促成了这篇短文的写作。因为这铭文与契丹国号有关，与国号契丹含义的理解及解释有关，与契丹文字书写的契丹一称的识读有关。这一问题目前尚有争论，三枚契丹钱币为我的论点提供了补充证据。①

二

三枚钱币的铭文，一曰：“开丹圣宝”，二曰“大丹重宝”，三曰“丹巡贴宝”。兹引《古钱大辞典》之图于下：



关于“开丹圣宝”《古钱大辞典》引《续泉汇》谓“此钱文曰开丹，或取契丹开国之义欤？”又引郑家相《辽钱考》则谓“既曰开丹，乃取开国之义。”前者有所保留，后者完全肯定，两家均解“开丹”为开国之义。愚意以为此说恐难成立。历代立国铸钱，并无开汉、开魏、开唐、开宋等类铭文，实在没有先例可援。笔者以为若将“开丹”视为国号，则种种阻塞立见开通。第一，开丹即是契丹，不过同名异写而已。开，唐宋音为苦哀切、丘哀切；契，唐宋音为苦计切、去计切。是开读[k‘ai]，契读[k‘ei]无疑。此音传入日本，日本至今仍读开为[k‘ai]，读契为[k‘ei]。可见二音极近。契丹是音译之名，从魏收《魏书》起，中原各朝都习用契丹二字。开丹，则当契丹统治区内初未习见契丹一译时自行音译之用字，故二者互歧。第二，契或开，是契丹谓大之语，开丹或契丹，即是大丹之义。大丹犹如大唐、大金。而音译意译一旦有所重复便成大契丹，所以，文献或石刻常见大契丹之称。第三，以国号铭币，其例多见，世所知者即有大周通宝、大齐通宝、大唐通宝、大宋通宝、大宋元宝、大元通宝、皇宋通宝、皇宋元宝等等。开丹既是大丹之义，则“开丹圣宝”自与上列诸铭同例。

关于“大丹重宝”铭文，《古钱大辞典》引袁寒云语谓“辽初号契丹，先代撒剌的以土产多铜始造泉币……厥泉曰大丹，而制作奇古，必撒剌的之泉无疑，至可宝也。”此钱是否撒剌的时所铸，笔者未曾研究，不敢妄议。然袁氏视大丹为契丹则极是。前头讨论“开丹”一称时，已经指出，开丹或契丹即是大丹。

关于“丹巡贴宝”铭文，《古钱大辞典》引郑家相语谓“丹为契丹国号，巡贴乃契丹之称钱”。巡贴，是否契丹称钱之语，笔者一时无据，不便发表意见，然郑氏视丹为契丹国号的论断，虽未申明理由但却完全正确。比较三则铭文，可以得知，契丹一称原由两

词构成。丹是中心词，契是修饰语，二语组成偏正结构，表示专名。全音译是契丹，半意译是大丹，全意译是大中。所以，国名方可简化为丹，却不可省称为契。此犹其后之大金。只可略称为金，却不可省称为大。所以，铭文作丹巡贴宝，而不作开巡贴宝或大巡贴宝。

这三则铭文，从实物资料方面，从当时习惯称呼及其用字方面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证据，对于认识契丹一名的构成、音读、意义、简称方式等等十分重要，对于研究契丹文字怎样表记国号契丹，对于怎样认定或识读契丹小字书写的国号契丹等等也十分重要，对于解决有关这些问题的歧见与争论同样十分重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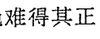
三

对这三例铭文的研究，笔者不想重复过去已经作过的论述，只愿扼要列出以下诸端：

第一，国号契丹，契丹所铸币铭写为开丹。唐宋音读开为[k 'ai]读契为[k 'ei]读丹为[tan]。此音必与契丹语所称之国号相近。所以，应以[k 'ai tan]之近似音去求契丹文字书写之国号契丹。反之，若随西人之后以[k 'it 'ai]读契丹，并以此读去解契丹文字，必然失误无疑。

第二，国号契丹，币铭又作大丹。这是半意译半音译之名。因此，应以"大"义解契丹之契，并以此义去求契丹文字书写国号的首词。不然，绝难得其正鹄。

第三，国号契丹，币铭简称为丹。这与《辽史》之称东丹而不称东契丹，《高丽史》中当与契丹交恶时称丹的情形，完全吻合。而大丹一称又表明契丹一名由修饰语与中心词所构成。所以，契丹文字书写之国号契丹，也必然由两词组成。若认为契丹一称是单词，并以之求于契丹文字，将永无解继之时。

第四，币铭之国号曰大丹。因以"大"义求契丹文字书写之国号契丹，则唯有字义已明之契丹小字可当。此字用为年号大康大安之大，其义绝无疑问。而《道宗哀册》册盖首二语是，正合首称国名之例。故可断定解为国号契丹无误。

第五，币铭之国号简称曰丹。是契丹这一专名的中心词无疑，而其音其位正与之相当。读[tuau]或[tuanin]，又是被修饰的中心词。故可判知解为契丹之丹。

第六，国号契丹，币铭又称大丹。是契丹语必谓大为"契"无疑。契读[k 'ei]，所以，文义为大之，只能读为[k 'ei]，不可读作他音。

第七，国号契丹，契丹小字书作。义为大，义为中，诸家均无异议。由此可知，契丹一名之义即是"大中"。

第八，币铭大丹，表明契丹一号实山两词构成。因此，明是单词之，绝难解为国号"契丹"。币铭开丹，表时契丹一号之音必与[k 'eitan]相近。而字至今无人解读为[k 'eitan]，故无缘附会为国号"契丹"。

第九，三则币铭，对于笔者已往关于契丹一号之语词构成、构成方式、语义、读音、简称等所作的研究及笔者所解读的契丹小字书写的契丹国号，都提供了极好的补充证据。

注：

① 即实：《契丹国号解》，载《社会科学辑刊》1983 年 2 期；《契丹小字字源举隅》，载《民族语文》1982 年第 3 期；《不等于不及—与刘凤翥同志商榷》，载《民族研究》1986 年 1 期；《皇黄无同意—读〈契丹小字解读再探〉所见》，载《内蒙古师大学报》1986 年第 4 期。

说契丹非年号钱

李　侠　高佐臣

契丹，是公元前十世纪初崛起于中国东北部地区的东胡系民族。公元 907 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八部。公元 916 年在龙化州（内蒙古昭乌达盟八仙筒）称帝，建立大契丹政权，史称辽。

辽代契丹铸钱，有纪年可考者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元神册（公元 916 年）后之年呈钱币。对建元前铸钱，《辽史·食货志》："先代撒剌的（阿保机之父）为夷离堇，以土产多铜，始造钱币"。其先代铸钱，郑家相《辽钱考》："太祖以前，国未统一，制度未备，且未立年号"。据以考证辽（契丹）非年号钱是为先代所铸，半个多世纪以来颇有异议。

契丹之非年号钱，经泉家认定者有："大丹重宝"，"通行泉货""开丹圣宝"，"千秋万岁"，"丹巡贴宝"，"巡掷拾贴""百贴之宝"，"巡贴千宝"，"巡贴直万"等钱币。今细审各钱，就其形制、钱文、铸造工艺而论，阿保机之先代铸钱，循迹演变，绝不会有如此差异之大，更不会铸出如此钱币种类之多。特别重要的是各种钱币 所表现出来的风格及神韵，确又各有其独特的不同时代的气息。为对契丹非年号钱之深入研究，略疏一已之管见，以作"他山"之引。

公元十世纪前，契丹处于氏族—奴隶制社会历史阶段，部落间剩余产品交换主要是以实物经济形态去表现，多以布帛，牲畜为交换之媒介物。由于受唐朝及五代封建社会货币经济和文化的影响，在契丹建元前初创币制，铸造工艺简陋，钱文拙朴，在铸造钱币上呈现有民族和时代的特征，跃然币上。

大丹重宝　丁福保《古钱大辞典》证为耶律阿保机之"先代撒剌的为夷离堇（公元 870—901 年），以土产多铜，始造钱币"所铸钱。以"大丹"显现于唐代"重宝"钱制之上，是为契丹与唐代货币文化相融合为特征的契丹钱币。制作浑朴，钱文拙劣，为考证辽代货币之上限和演变，提供出时代依据和佐证。

通行泉货　郑家相《辽钱考》："审其制作文字则浑厚朴茂，文曰泉货，尚不脱六朝遗意，其为契丹未有年号时铸此。以充行用……"今见有实物传世及在辽饶州遗址出土。《辽史·食货志》："太祖其子，袭而用之，遂致富强，以开帝业"可证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元前（公元 901 年）为夷离堇铸。未立年号，且行泉货，标志着契丹由原始氏族的实物交换，转向奴隶制货币交换的萌芽时期。

开丹圣宝　辽太祖元年（公元 907 年）耶律阿保机废选举制，即位可汗。乃仿唐代"开元"钱制，当符契丹建政开元之义。钱文形制与"大丹重宝"风韵，无甚大差异，同为契丹早期的试铸钱币，见于辽宁省博物馆藏一品。

千秋万岁　《古钱大辞典》引宋李孝美《历代钱谱》："此钱径三分，文曰'千秋万岁'，今甚易得，盖常岁北使入贡人多博易得耳"。今见有辽上京遗址出土。查辽太宗耶律德光会同元年（公元 938 年）改皇都为上京，"置五冶太师，以总四方钱铁"当铸此钱，用以象征契丹封建政权命运长久之吉语纪念钱币，故辽（契丹）使入贡于宋多博易得。而郑家相《辽钱考》："此钱之铸，必在太祖以前，国未统一，制度未备，且未立年号，，故以千秋万岁为文"列为契丹建元前铸钱。考契丹建元前系试铸钱，数量绝少，不可能到宋代尚"人多博易得诸贡使也"。今审其钱文、形制均较"开丹"钱精整，不似建元前粗创币制时所铸钱。据遗址出土，辽使入贡于宋考证，均同上京有着密切的联系，当为辽太宗改皇都为上京铸。

契丹"巡贴"钱　丁福保《古钱大辞典》列有"丹巡贴宝"、"百贴之宝"、巡贴千宝"，后发现有"巡掷拾贴"、"巡贴直万"等钱。对"巡贴"钱的 断代，郑家相《辽钱考》认定为辽未立年号前所铸钱。据"巡贴"钱文及制作形制考证，亦均较精整，不类契丹建元前之"开丹"钱。

按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元年（公元 983 年）改辽